

目 录

我参与日本战犯审理工作的一些回忆·····	崔汉明	(1)	✓
元泉旅团在山西的覆灭·····	〔日〕榎本舍三 崔汉明 译	(13)	
日寇在太原地区的暴行·····	张中唐	(28)	
日寇血洗晋阳堡·····	张其昌等整理	(31)	
日本占领军在西张村的暴行·····	李 哲	(33)	
失去人性的日本侵略者·····	吴芝兰	(34)	
残暴的兽行·····	金维范	(36)	
碌碡岩惨案·····	雷振智口述 阎 门整理	(38)	
日寇血洗大夫庄·····	郝成芳	(41)	
“七·七”忆旧·····	白松鹤	(43)	
日本太原宪兵队的罪行·····	史法根	(45)	

我参与战犯审理工作的一些回忆

崔 汉 明

太原战犯管理所，位于太原市的东北角——小东门内。

在这里，曾关押着一百四十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包括因病死于狱中的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直接制造者河本大作等在内。其中，有曾犯下各种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原则的严重罪行的军政人员；有直接进行杀人、放火、强奸、掠夺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有操纵敌伪傀儡政府，奴役我国人民的顾问等行政官吏；也有无恶不作、罪恶滔天的警察、宪兵和特务间谍分子。

在这里，我国政府对于这些在押的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长期的侦讯工作，从各方面调查收集了充分的证据，并且对各个罪犯进行了讯问。

同时，又以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还对他们进行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教育。

就是这里，在日军侵华期间，原是一座俘虏集中营。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的鲜血洒在这里。而今天，这里却创造出了历史上的奇迹。一群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在中国人民这种人道主义的感化之下，从顽固抗拒到认罪伏法；再到惭愧悔恨；最后借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从各位那里得到了两种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回国的战犯中，江先光氏写了一本题为《千人战鬼》的回忆录，记录了把“鬼”变为人的中国战犯监狱的奇迹。

一、人道待遇

在管理所里，我国政府一面严肃地侦察他们的罪行，同时又以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他们。

大多数人在刚被关押的时候，曾经掩藏自己的罪行，自称是无罪的人，有的人还抱着军国主义思想，幻想将来东山再起。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都以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敌不过美国侵略者的，有的人还幻想美国人会打进来，释放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全都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

过去，这里就是日军在太原城内设下的一座人间地狱——太原工程队。当时被囚禁在这里的中国俘虏们，每天过着牛马不如的低层生活，从早到晚还要强迫做苦工，许多人被虐待和拷打致死。而现在，在中国管理战犯当局却保障犯人的生活和健康，不打不骂，不侮辱犯人的人格。

在管押期间，战犯管理所还对他们进行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教育，并给他们以各种学习的机会，购置了不少图书，还订阅了中日两国间的一些报刊。他们自己还组织起“学习委员会”，举办讨论会，出版墙报，还发动每个人结合自己所犯罪行，写出揭露侵略战争罪恶的题为“我们所走过的罪恶之路”近三百篇的手记。在文娱活动中，还可以看到他们自己举办的歌咏、演剧和运动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管理所还经常放映电影，有不少是日本电影。在学习和活跃的文化生活中，不少人逐渐明辨了是非，思过悔罪。

在医疗卫生方面也给予一定关心。一个身患重病而得到太原一所医院治疗并输血才恢复了健康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杉山安太说：“我曾经在中国犯下了许多残暴的罪行，但是中国人民却用他们的鲜血挽救了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他还说：“像我这样的罪人，是死有余辜的。但是中

政府却始终如一地给了我人道主义待遇。在我就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的这种宽大处理，我要将我的后半生献给和平事业。”

在管押期间，还组织他们到太原及附近的工厂、农村、学校进行参观。一九五六年五月，还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的罪犯一起，先后两批到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等十一个城市进行了参观。他们对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民“不咎既往”的宽大胸襟，都受了很大感动，反映普遍良好。

“新中国对我们这样关心，使我们更加尊敬中国，再要有侵略思想就不是人了。”

“中国人民想一切办法使我们重新做人，这种关怀真是伟大，今后一定要站起来重新做人。”

“破坏和平的侵略战争是多么惨无人道，同时阻碍了社会发展。我决心争取做一个和平战士，保卫和平。”

这样一批曾经积极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人，最后能够有所悔悟，是经历了很长的过程的。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被判刑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得到中国政府的允准，分别在抚顺、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会见了他们的家属。

在太原战犯管理所里，有九名家属远从日本渡过重洋来到这里会见了他们的亲人。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富永顺太郎会见了他的妻子和九岁的女儿。富永顺太郎问他的妻子富永贵美子说：“现在的中国和你想像的中国不一样吧？”富永贵美子说：“只要从让我们来中国这件事就可以完全看出来，没有想到一个战争犯罪分子的家属受到这样的待遇，真是感激。”

二、正义审判

这里是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当年，曾经无辜地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蹂躏过的国土，如今，在高悬着金光闪闪的国徽下，正对曾经闯进这块土地杀人放火、胡作非为的八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进行正义的审判。

这八名战争犯罪分子是：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附兼政工部（处）长城野宏；前日本陆军独立第三旅团第九大队大尉大队长、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团长相乐圭二；前日本陆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炮兵大队大尉大队长、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炮兵团长菊地修一；伪闻喜县、安邑县保安队联队本部指挥官、阎锡山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上校团长永富博之；前日本陆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第二四四大队大尉中队长、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上校团长住冈义一；伪大同省应县公署参事官、阎锡山第二战区炮兵集训团中校教官大野泰治；伪山西省壶关县政府顾问、阎锡山暂编独立第十三队少校军需事务长笠实；伪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队首席指导官、阎锡山大同保安总队司令部少校情报主任神野久吉。

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活动，充分表现着我国检察、审判机关工作中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高度民主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长期的侦讯，取得了大量的、确凿的罪证。

法庭在开庭公审前五天，就把起诉书的日文译本送给了各被告人，并为他们指定了辩护人，使他们都有时间进行出庭的准备。在开庭的第一天，审判长向被告人解释了他们有充分的辩护的权利。法庭指定的辩护人，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一些情节和理由，为每一个被告人做了辩护。法庭上的每一句话，都当庭用日文翻译过来，使被告人了解。

对城野宏等八名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

审判，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起在太原开庭。

法庭在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开庭。首先审讯相乐圭二。庭审调查证实：相乐圭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期间曾多次命令和亲自指挥部下杀害中国和平居民、俘虏和抗日军队的伤员。日本投降后，相乐圭二又鼓吹复仇主义，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煽动日本士兵参加阎锡山反革命军队，并以阎锡山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团长等身份，率领所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

第二个被审讯的是山西日伪政权的参与操纵者，日本侵略军“残留山西”运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城野宏。

城野宏在担任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期间，曾参与制定了“民国三十三年度山西省施政大纲”，这个施政大纲的总方针是“集中全省人力、物力，支援大东亚战争，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使命。”按照这个方针，被告人操纵伪山西省保安队、警务厅和剿共委员会等机构，扩充伪保安队，并且组织了二十多个以消灭边区抗日根据地为目的的联防区，“以中国人杀中国人”；被告人并且多次向伪道尹、县长指示：保安队要多用出动“扫荡”、抢粮，配合日军作战，并且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标准。被告人还主谋策划和亲自指挥伪直属保安大队——后改为“山西省剿共军”进行了多次“扫荡”。被告人的罪行，为被传到庭的伪山西省保安队副司令赵瑞、伪冀宁道保安队指挥牛新田等证人分别证实。

证人证实：在日本投降以后，被告人主谋发动了煽动日本军政人员留在山西的“残留运动”。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和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先后会见了阎锡山的代表赵瑞、梁延武和锡阎山本人。并且组成了协助阎锡山反共的日阎合组的“合谋社”。他在“合谋社”，一方面著作了作为“残留运动”理论基础的《日本人的立场》一书，煽动日人的复仇主义，要他们“卧薪尝胆，为了复兴祖国而残留；”一方面组织了大批日本

宣传员分别在太原、榆次、阳泉、忻县、大同等地的日本部队、医院中进行煽动。在被告人和岩田清一等策划下，先后纠合了前日本军政人员五千多人，在一九四六年春组成了一支变相的武装侵略部队“特务团”，后来改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被告人亲自担任少将总队附兼政工部(处)长。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解放，这支部队被全歼为止，被告人一直参与指挥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

当时任阎锡山第七集团军司令的赵承绶也出庭作证。

被告人和岩田清一等为进一步扩充这个变相的侵略武装，曾多次向阎锡山建议从日本招募“义勇军”。一九四八年五月，被告人亲自草拟了从日本国内动员“义勇军”五十万人来华以及建立“防共政务局”和“实施全世界规模的反共解放运动”的计划，多次派人回日本活动，并且派永富博之等赴上海、平、津等地，企图建立同日本的联络据点以及开辟中日间的密航路线。

另外，被告人还在一九四八年十月草拟了一个情况报告，向蒋介石国防部提出在日本招募五百名军官来华的建议。

法庭审讯了被告人永富博之和菊地修一。他们曾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指挥部下残杀我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在日本投降后又都积极追随城野宏，煽动前日本军政人员残留山西，参加反革命军队，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永富博之在山西省闻喜县主持伪横水镇情报工作处期间，曾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刑讯中国和平居民，逼索情报，先后亲自指挥和命令部下杀害了一百多人。他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在沁源县自强村将党翠娥等妇女和儿童十一人赶入窑洞纵火焚烧。幸免于难的党翠娥从沁源县赶来太原向特别军事法庭控告被告人的罪行。

接着，法庭进行对大野泰治、笠实和神野久吉的事实调查，他们都是傀儡政权和伪警察的直接操纵者，犯有进行经济掠夺、

毁灭城镇和残酷镇压和平居民的罪行。他们并且都积极参与了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残留运动”，煽动组织了大批日本军政人员参加阎锡山军队。大野泰治于一九三六年在伪满时，曾经以残酷手段刑讯中国民族英雄赵一曼。

法庭最后审讯了住冈义一。住冈义一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曾两次参加了日本侵略军在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屠杀我被俘人员的暴行。在这两次暴行中，八路军被俘人员袁立天等男女三百四十余人被作为日军新兵“试胆刺杀锻炼”的活人靶。

审判揭露，这八名犯罪的暴行都是非常严重的。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国家公诉人严正地控诉了并由许多证人和受害人证实了这些战争犯罪分子的严重罪行。在大量确凿证据面前，被告人都一一供认不讳。

法庭给予了各被告人以充分的申诉意见的机会，并由辩护人为他们做了辩护，并根据被告人服罪和悔罪的表现，请求法庭从宽处刑。

所有受审的日本战犯在法庭上都作了悔罪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表示。城野宏在最后的陈述中说：“我犯了严重罪行，是个不可宽恕的罪犯，可是中国人民，却给我人道主义的待遇。我完全错了，我的确有罪，请给我以严厉惩处吧。”

相乐圭二说：“我从我的血腥的罪行中了解到自己过去所走的战争的道路，是完全错误的，我不仅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无穷尽的祸害，而且也为日本人带来了不堪忍受的灾难。我绝不再拿起侵略武器，我宣誓要重新做人。”

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和神野久吉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也一致地认罪悔罪，表示愿意接受法庭的惩处。

根据辩护人提出的理由和被告人悔罪的表现，特别军事法庭按照“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的精神，对这八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做出了严正而宽大的正义判决。军事法庭判处城野宏徒刑十八年，相乐圭二徒刑十五年，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大野泰治徒刑各十三年，住冈义一、笠实徒刑十一年，神野久吉徒刑八年。

三、宽大释放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的三百三十五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一致表示感激。许多人在宣布免于起诉决定的大会上忏悔了过去，并表示决心要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和促进中日友好关系贡献力量。

在太原，被免于起诉宽大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中，有许多人流着眼泪接受了检察员发给他们的免于起诉决定书。

在“免于起诉决定书”上这样写着：“按照该犯等所犯的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交付审判，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姑念该犯等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或者是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因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上中正高等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第一批三百三十五名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

在接到免于起诉决定书后，许多人都热泪盈眶，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恶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实。几年来，受到中国人民的人道待遇和无微不至的关照，今天又得到免于起诉宽大释放的处理，对这个事实不仅感到惭愧，也给了力量。大家表示决心：今后一定要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为

中日友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前日本陆军上等兵、阎锡山军少校大队副寺本秀则，当他谈到他在管押期间受到的人道待遇并和他过去的罪行相比的时候，他哭不成声。寺本秀则最后说：“我要向那些被我杀害的中国人民的家属宣誓，今后在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都要承认我过去犯下的罪行，通过自己的罪行向全世界人民揭露帝国主义的残暴本质。”

接着，七月十八日，八月二十日又分别对三百二十八名，三百五十四名从宽从理，免于起诉者即行释放。

在离开管理所前，管理所和中国红十字会赠送了他们服装、鞋袜、毛巾及其它日用品，还有五十元零用钱。

管理所的告别会上，他们纷纷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受到母亲般的照顾，实在感谢！”

“我们现在满怀向着新的人生路途进军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我们心里充满着更好的希望。”

于是，在《东京——北京》、《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的歌声中，佩带着归国日侨的胸章，他们告别了他们的“再生之地”——居住了多年的管理所。

四、归国之后

一九八六年夏，应邀赴日访问。在一个多月参观访问的日子里，使我深受触动的事很多。但一次难以忘怀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东京上野公园附近的一家中国饭馆里，我作为前太原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会见了由太原回去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汤浅谦、辻宗盛、冲勇、中川博各位，还有该会的顾问佐藤峰南先生。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是由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回去的人们自己组成的组织。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信守着离开中国时的誓

言，为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们原有一千多人，除已病故者外，还有八百人左右，一般都已六十多岁，还有一些人已逾七、八十岁高龄。但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削弱，他们的妻子、子女也都投入了活动。特别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它们召开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统一大会”后，力量更是加强了。大会通过的宣言一再强调，今后要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和促进日中友好，为帮助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通过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日本人民，对中国所进行的十五年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三十年来，他们通过讲演、展览、出版等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远在一九五七年，他们就写出了侵华罪行录《三光》一书，轰动了当时的日本，成为畅销书之一。尽管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然而正如他们所预料到的“今后在我们面前，将有很多的困难，也会刮来许多风暴，但我们决不害怕困难”，他们没有被吓倒，还继续出版了《侵略》、《从中国归来的战犯》、《战鬼》、《未被处刑的战犯》、《难以消灭的记忆》等手记、回忆录和小说等，在日本具有一定影响。

《难以消灭的记忆》一书，就记录了侵华期间汤浅谦医生在潞安陆军病院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行事实。

“如果我不加以叙述，那么，数十名、数百名军医所犯下的活体解剖的罪行，就会烟消雾散，从日本历史上抹掉。”汤浅医生还接着说：“希望让年轻一代都认识到战争的可怕，罪恶的深重，事实不应该冲淡，更不应该掩饰。”

尽管汤浅先生已年逾花甲，身体并不太好，而且开设着一家诊所，工作也较为繁重，但正如他说：“只要不妨碍工作，一定要出席讲演会，讲一下自己的过去，让大家知道，绝不能再走侵

略的道路，这样也可赎愆我过去的罪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也是在座的其它各位和“中归联”全体成员的意愿。

在《难以消灭的记忆》出版之后，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震动，几个月内发行量达五万部，在以后的日子里，汤浅先生——亲历侵略战争的见证人，一直忙里偷闲应邀参加各种集会，在大学的讲坛上，中学小学的校园里，各种纪念的集会上，面对着年青的一代，对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企图阻碍历史前进的那股逆流予以有力的揭露和批驳。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但它的残余在日本并没有绝迹。在这方面，“中归联”和日本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人士和广大人民一起坚决反对。在东京举办的一次“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资料展览会”上，他们汇集了一些照片，证据确凿地重现了日本侵略军当年在南京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场面。日本一家报纸指出，这些照片是驳斥所谓“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滥调的铁证。

在关于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以及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等方面，他们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强烈谴责。对于近来日本政府制造的损害中日关系的光华寮事件，他们也绝对不会保持沉默的。

在此期间，两国之间还多次互访进行了交流活动。一九八四年十月，原抚顺、太原管理所友好访问团应“中归联”的邀请赴日进行了为期十日的访问，管制者应被管制者邀请访日，日本报纸称做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欢迎的盛况，正如《读卖新闻》的报道标题：“狱中之恩难忘却，不禁热泪喜重逢”。

年已九十四岁的原伪满间岛省长(现吉林省的一部分)岐部与平，原安排在二十日欢迎宴会上致欢迎词，由于突然患了重感冒，卧床不起。三十日早晨七时半，他通过电话告诉代表团，他的病刚好，要去机场送行。十时四十分，他由女儿搀扶到成田机

场。他见到代表团感慨地说：“我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见到先生们了，不能不来。我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繁荣富强。”原日军士官佐藤福次的夫人，捧着已故丈夫的遗像，从北海道千里迢迢赶来仙台，见到代表团时痛哭流涕地说：“我丈夫活着的时候，很想见见先生们，说几句感谢的话，今天我替丈夫特地赶来向先生们致谢。”这次参加欢迎活动的还有不少“中归联”成员的家属和遗属。

此情此景，难以忘却。他们变了，的确变了，由过去的侵略者，变成了现在的亲善者；由中国人民的敌人，变成了中国人民的友人。

元泉旅团在山西的覆灭

——日、阎勾结的前前后后

〔日〕 榎本舍三 著

崔汉明 译

—

一九四五年二月末，军司令部的一辆“Nō、I”小轿车停在了我们的住所门口。

“元泉阁下请您和夫人一道光临军人会馆。”来人传达了元泉少将的口信。

不巧，妻子由于偶患感冒，正在卧床休息，我只好独身前往。急急忙忙地换上衣服，一个人坐进了来迎的轿车中。

军人会馆是关东军高级军官的聚会场所。

进入二楼的小房间，少将立即起立，寒暄致意。

房间里，还坐着一位身着黑色中国服的老人。“这位是郝鹏（汪伪江苏省省长——译者注）先生。”一就座，他给我介绍了这位老人。“这就是我提到的那位作家榎本先生。”又用中国话向郝鹏介绍。

会见时的气氛很轻松，没有流露出当时的关东军的那种不安和沮丧心情。新年时，我曾见到山田总司令官和笠原参谋长。这一天，又遇上了他们，从这些军部首脑的脸色上，看不出开朗的表情。

欢送高级军官的公私宴会都在这里举行。

眼前，坐着一位老政客，一位高级军官，都有着年轻美貌的妻子。但他们的运命难卜，我无意识地拿起餐叉，在思索着。

听到了元泉少将调往山西的消息，郝鹏就专程来到新京（即今长春一译者注），大概是受到王克敏一伙的排挤，想要依靠元泉一同前往山西吧！看来，少将有些作难，但又以赢取对自己信任的口吻谈论着。

自战国以来，山西省的潞安就是军事要地，兵家必争之地。调往山西前，少将的这句赠别留言，一直萦怀在我的耳边。

元泉少将终于来到了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卷入了国共内战的涡流中。大部分的日军官兵战败后虽然幸运地撤回自己的祖国，而元泉却在这座深山里，葬送了他的生命。

山西是华北的一个省。面积一六一·八四二平方公里。

元泉兵团（垒兵团）司令部驻在晋东南的潞安。现在，这里叫长治，正确的名称是长治县。当时，一般都称为潞安。

这里是两条河流——潞水和故城水——的汇合处。潞安县城周围有二十多华里的城墙。历史上饱经炮火，已看不到它是晋东南重镇的迹象。据一九四一年的记载，当时人口仅有万人。

在一九四五年那个时刻里，阎锡山遵照日、阎双方所签订的协议退居黄河一线。当时，山西全省的治安和防卫责任，全部落在了日军第一军（乙集团，司令官澄田睐四郎中将，驻于太原）五个兵团的肩上。

元泉馨以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的身份，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在潞安的旅团司令部就任。

以后，作为“打通大陆×号作战”的一环，转战各方，几乎得不到片刻休息。

当进入投降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中国十一个省的广阔的土地上，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陷入了内战的炮火之中。在山西留

用日军也卷进了内战的涡流。

当时，共军的战斗力和国军相比，正在逐步加强。最初，晋冀边区的刘伯承军以极大兵力投入了攻克大同的战斗，据说达二十余万。但受到了守卫大同的日军炮兵的阻击，又转向太原。

元泉兵团的半数，即以这一庞大兵力为对手，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秋，多次参与了以太原为中心的攻御战斗。据记录，这次攻守战的最后阶段，共军投入的总兵力达四十万。

有关“打通大陆×号作战”的一些情况，简单叙述如下。

所谓“×号作战”始于一九四三年底所举行的“虎号兵棋演习”结束之后。当时，日军当局为了实现其拟定的计划而决定，代号为“一号作战”。其作战目的是：

一、为了防止本土受到空袭，应夺取桂林、柳州等美国B29航空基地，确保本土安全。

二、确保桂林、柳州及其周围，做好应战准备，以对付敌军印度、缅甸、云南向华南方向的攻势。

三、鉴于海上交通逐步陷入困难这一情况，应修复贯通的铁路干线，确保北方和南方各军的联络。

四、对重庆军给予致命性的打击，尽快推动重庆政权走向灭亡。

一九四四年一月，也就是在兵棋演习结束之后，经过反复的总结，由于考虑到二、三、四项的实行力量不足，于是决定仅以一项为目标进行之。

整个战役命名为“一号作战”其中京汉作战称为“二号作战”，湘桂作战称为“卜号作战。”

战斗开始，按照计划，进度较为顺利。但和往常一样，补给路线时断时续，行军路线难保畅通，预期日的终于难以实现。到一九四五年不得不收缩战线。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午夜二时左右，尽管日苏互不侵犯条约还没有失效，苏军已开始越过北、东、西三面的国境线进入满洲。

八月十日午后，元泉兵团获得了日苏、满苏开战的确切情报。

据当时担任元泉旅团作战情报主任的青野大尉的记录，十日下午，太原第一军司令部给兵团参谋部发来了有关苏军参战的第一份电报。接着，又发来了第二、第三、第四份急电。接到电报后，密码班的朝川中尉立即向参谋部的四个大尉报告，大尉又向内山参谋大佐做了报告。

第三份急电的主要电文是：“在华侨民不应抱有战败感。”

第四份急电是：“全军将向满洲转进。各兵团立即做好准备，听候命令”在电文的最后，还附有阿南陆军大臣“食草伏野，死中求活”的例常训示。

从元泉誓死后所遗留的片纸隻字的遗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元泉的心情，是非常乐于接受电文中“全军将向满洲转进”这道命令的。

“战局将临紧急关头。事到如今，我们应放弃一切，誓死捍卫满洲。舍此而外，无路可走。对向满洲转进这一命令，我们已深刻理解。但问题是，兵团能否顺利地撤离潞安，具有优势的共军部队控制着撤向满洲的进路。而且，兵团的正面还有第二战区的部队在守候着，这是一支态度暧昧的敌人。”（吉野三郎）

当时，第一军司令部驻于太原，司令官是澄田睐四郎中将，隶属于北支方面军（一般称为甲方面军，司令官是下村定大将）。

第一军（乙集团）下属五个兵团，即：

第一军直辖兵团

第一百一十四师团（将兵团）三浦三郎中将（驻临汾）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造兵团）山田三郎少将（驻崞县）

独立步兵第十旅团（固兵团）板津直俊少将（驻太原）